

第9章 何谓富裕？

这还是六七年前的事。绿化团的成员问我：“农村人到底什么时候干活？”

我一时语塞。不过想想看，这么问也不无道理。

农村一般是在一早一晚干活。如果住在县里招待所是接触不到这些的。当我们坐车进村时，农民已经干过一阵活儿正在休息，等我们坐车离开村时，他们才又开始去田里干活。特别是夏天烈日当头的时候是不到田里去的。在我小时候日本的农村也是如此。

于是我想哪怕是一个晚上也好，最好能让绿化团的人在农家住一宿。在大同事务所的奔走下，几年前我的愿望得以实现。对农民来讲，接待绿化团住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农民们没有多余的房间给外人住，为腾出一间屋子，家里的一些人只能到亲戚和朋友家去住。

为防止发生意外，公安人员和一些干部不休息，轮流在村里巡逻打更。不过，次数多了也就渐渐地习惯了，现在不像一开始那么精神紧张了。

2001年夏天，我住在大同县中高庄村的农家。利用晚饭前的一点空隙，我独自溜达到村头。这时看到很多中耕的农民扛着锄头从各自的田里往家走，也有的人坐着驴车往家赶。我就冲他们喊：“你好！”他们报之以腼腆的微笑。

在村头有一个打谷场，500多平方米的场地平平整整，很适合在这里做游戏。小学校十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对唱着正在玩游戏。我观察了半天也没搞清游戏的规则，只好甘居局外了。

这时，一个老婆婆叫着孙子的名字：“吃饭啦。”男孩儿回答：“不



图：在农家住宿后回到集合地点。虽然只住了一宿，和当地人的感情更加深厚了。（大同县，2000年9月，桥本摄影）

吃。”估计还没玩儿够。老婆婆又说：“那就不给吃啦。”男孩儿回答：“不吃就不吃。”看着眼前的情形，我朦胧了，一时搞不清眼前的一切是现实，还是我儿时的记忆。尽管如此，在一起游戏的伙伴们还是一个一个地走了，直到一个都不剩。

接着又出现十几个孩子，领头的是中学生模样儿的女孩子。他们年龄相差很悬殊，小的只有三四岁，走路还不稳当呢。这样的情形在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呢？

回头看一眼西边，我惊愕了。透过杨树的枝条，一轮巨大火红的太阳正慢慢地消失在地平线上。真红！真大！别说是在日本，就是



图：儿童是游戏的天才。没有道具，也能自己不断创造出新的游戏。这种情形在日本已经成为过去。（灵丘县，1999年）

在中国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夕阳。当我急匆匆叫着绿化团的人来看时，只剩下半个太阳了。大家异口同声：“太棒了，真是激动人心。”

如果没听过驴叫的人听到驴叫声肯定会吓一大跳。我请喜欢观察鸟的汉语老师池本和夫用拟声语形容一下驴的叫声，他苦思冥想，最后还是没想出来。驴的叫声很悲哀，给人带来伤感。

放牧的羊群回来了。放养的小鸡也回到窝里梳理着翅膀，渐渐地安静下来。

晚饭时我向主人敬白酒，他只沾了沾嘴唇，并没有喝的意思，

啤酒也不喝。我很少见到这种情况。他说：“受苦人不喝这东西。”受苦人，用日语怎么表达呢？翻成“Hatarakido”？我过去生活过的农村曾经用过这个词，不过也可能有人说这不是日文。

雨天对话

2002年9月，碰巧又住在原来那户农家。从北京来的翻译冲着主人就叫“大爷”。主人鬓发斑白，脸被太阳晒得黝黑，皱纹很深。我赶紧截住他的话：“你别这么叫，他肯定比你年龄还小呢”。翻译吃了一惊，一问，主人的年龄比翻译小两岁，和我是同年。

这次主人情绪比较好，和我说了很多话。一起来的是三得利工会代表团，自他们到大同以来一直在下雨。在这之前有40多天没有下过雨了。因此所到之处大家都高兴地说：“是你们给我们带来了雨。”

“如果晚上不好好洗手，疏松一下关节，第二天早上就拿不住东西，关节弯曲不了，受苦人都这样。天天干农活，到了这个年龄就开始闹毛病了。城里人有退休，农民无论多大年龄，只要活着就得干活。

“农活没完没了，没有说干到啥时候了是个头。有勤快的，也有懒惰的。那么是不是勤快了就有回报呢？也不一定。单从表面上看，看不出干的活有什么区别。但是不干也不行啊，这大概也是命中注定的。

“收获黄花菜时是最要劲儿的。早上3点半起床，顶着星星去地里。眼睛隐隐约约能看见黄花菜的花蕾，摘下放进挂在脖子上的袋子里。如果花开了就不值钱了。10点之前必须干完，口袋重了，肩膀和脖子勒得生疼。走回去把它倒到筐里又太费时间，所以也就忍了

“花摘回来后要马上加工。要先熏蒸一下，然后摊开晒干。如果太磨蹭，就会沾上怪味。根本没时间吃饭，连水都不喝一口。有时只吃晚上一顿。在夏天，这样的日子要持续40多天。



图：全家在耕种。没有农耕机械，也没有家畜。身后可见烽火台和长城，对面就是内蒙古（天镇县，1996年9月）

“去年是大旱年，所以价钱卖得还不错，每斤5块钱。今年丰收了，可是价格下来了，每斤卖4块钱，整个收入差不多2000块钱。但是活儿太苦，肥料呀，浇地呀，费用太大，剩不多少。”

黄花菜为夕萱的同类，开花前的花蕾可食用。鲜的黄花菜炒着很好吃，但只有在产地才能享受到那样的奢侈，一般是把晒干的黄花菜泡开后烹调。大同县是黄花菜的产地。最近我在日本的超市看见有卖的，名叫“百合花”。

第二天下大雨，我们只好放弃户外工作。这样一来，又有幸和主人继续聊天了。

“早上好！睡好了吗？汽车喇叭把你们吵醒了吧。这是去大同的汽车，每天一大早出发，午后回来，完了再去大同，傍晚儿再回来。一般是去医院呀、买东西呀，到城里办事的人坐，没有人坐这车上班的。

“今几个天儿不好，正好我也可以歇会儿。对农民来说，也只能是下雨天歇歇，平常总得干活儿。等雨停了，还要上窑洞顶上把土夯实，不然的话就会漏雨。

“你说去年那丫头？那是俺家老闺女。今年也离家到大同的超市打工去了。两个儿子都跑到新疆什么挺远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俺们两口儿了，着实有点寂寞。

“现在这时代，男孩女孩都一样，女孩反而更好。女孩即使离家，一年也要回来几次孝敬我们。男孩子一年顶多回来一次，可能都孝敬丈母娘了吧。

“什么？现在大同农村还有生三四个孩子的吗？俺村哪，如果头一个儿是男孩就不要了，如果是女孩就再要一个。小孩的数量已经少多了，孩子太多养不起呀。

“俺原以为俺村最穷，怎么？还有比俺这儿还穷的呀。别的县俺不清楚，只是听说天镇县更穷，可没想到会那么穷！要说大同俺还会去，天镇嘛，俺压根儿就没想去。

“早上开的那趟汽车到大同，一去的票价是2块，没人会坐这车去打工的。一天打工的工钱是15到20块钱，谁会来回花4块钱坐车呀。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已经增长了几十倍，但是物价也涨起来了。不过我们受苦人的生活没什么太大变化，还是住在土窑洞里。

“年轻时，大约30多年前吧，我也在外面干过活。在煤矿运煤，每天的工资是一毛钱，干满一个月才挣3块，而且到月底才支付，所以手头总是空空的。

“也不能在外面吃饭，太费钱。俺都是拿上玉米面窝头去干活，再让食堂给碗热水，也就凑合过去了。

“去煤矿的途中路过云冈石窟。每次路过时俺都从外面往里望，特别想进去看看。当时门票是5分钱，就是这样也不愿意花，因为挣的钱勉强够生活。俺每次去干活时都要路过门口，看门的人都记住了俺，说‘你是农村来得吧，想看吗？’俺说：“想看。”他让俺悄悄地溜进去。虽然门票才5分钱，可几乎没人参观。

“现在云冈石窟的门票是50块钱吧，是过去的多少倍？100倍？不对，是1000倍！但参观的人多多了。到大同打工，一天顶多能挣15到20块钱，你让他拿出二三天的工钱买门票，不太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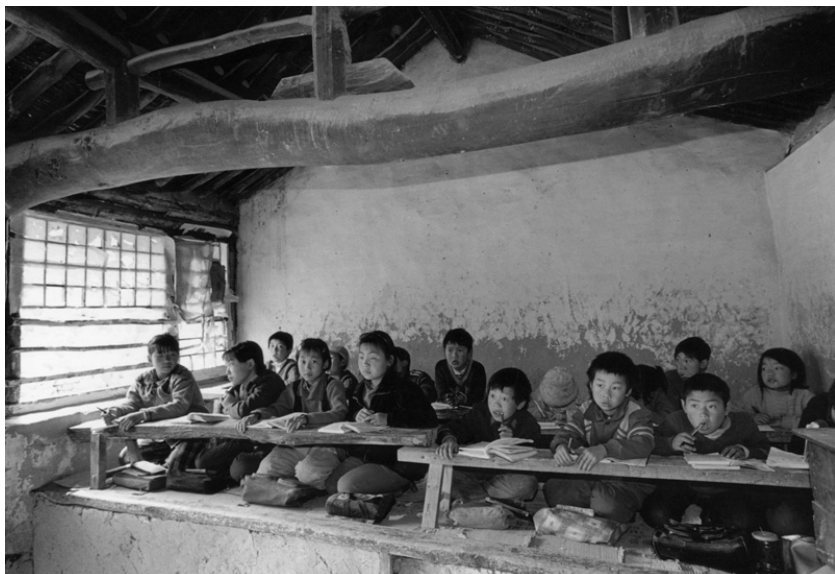
“你们从东京来的？飞机是什么模样呀？哎，只要3个小时，那么近呀。机票多少钱？6000块！那么贵啊！我以为五六百块就够了呢。”

供孩子们上学的贫苦农民

天镇县李二烟村是我们搞绿化活动中最贫困的村庄之一。一般村里都有出外打工挣回钱盖的砖瓦房，但是李二烟村一栋也没有。只有一些已经开始破损的窑洞紧紧地趴在黄土丘陵沟壑的斜坡上。有许多窑洞在1995年发大水时土墙上出现裂缝，靠杨树干支撑着。

那是发生水灾那年春天的事了。头一年秋天滴雨未下，强烈的西北风卷起干透的表土。草还没有发芽，没有饲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瘦弱的羊儿被风刮得踉踉跄跄。我和王黎杰一起到农家了解情况。一般听到的都是生活如何艰辛。

“上面的闺女小学六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如果是男孩，就让他上初中，女孩子念完小学就行了。”母亲对我们说。正好这时两个女儿放学回家。姐姐的脸通红，眼看着眼泪充满眼



图：村里的小学校。孩子们的求知欲很高，也很希望能继续学习，但村里没有高年级。（灵丘县，1999年，桥本摄影）

眶，之后开始抽泣起来。低学年的妹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奇怪地看着突然哭泣的姐姐。

接着又听说有一个家庭让4个孩子全部接受了高等教育。王黎杰坚持要去看一看这家。我说不用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城里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辛苦，条件那么好还不愿意学习。我回去以后要讲讲农村的孩子是如何艰难求学的。”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非常破旧的窑洞。大概正在午睡，一个不起眼的小个子男人一边提着裤子一边走出来。

我问他：“你想让孩子们上大学，祖上有读书人吗？”

“我们家代代都是贫农。”

母亲代替不太爱开口的父亲打开了话匣子。

“孩子们都喜欢学习，从学校一回来只要有时间就读书。我们这辈子受尽了苦，如果有可能，想让孩子们走另外的路。把养的羊卖掉，农具也卖掉，把谷子和黍子都换成现金，自己每天只吃土豆。这还不够，最后只好到亲戚那里借钱。

“大儿子从太原工业大学毕业后，在大同电力公司工作。他省吃俭用，把剩余的钱寄回来供弟弟妹妹读书。这样我就好过多了。二儿子也大学毕业了，两个妹妹在太原上大专。大儿子上的是好大学，毕业后又在大公司工作。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找一个干部的女儿结婚。可我们太穷，大儿子只好和工人的女儿结婚了。”

我说：“这样才好，如果是不会过日子的干部子女，也不会好好待你们的，还是娶工人的闺女好。”

孩子父亲插嘴说：“你说得太对了，儿媳妇待我们可好了。”

我问：“孩子都到外面去了，你们不寂寞吗？”

回答：“回到村儿里也找不着用得上的工作啊，所以早有思想准备了。”确实如此。

我本来不想问，所有这些不用问我也清楚。我的双亲也是贫苦农民，他们经常对我们说，“不希望你们和我们一样整天像田螺在地里爬来爬去。我们自己这样就足够了，想让你们走另外的路。”但是只能允许一个人上大学，于是就让哥哥把机会让给我这个老二。哥哥尽管也很想上大学，但还是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并给我往东京寄生活费。

可是我一入学就热衷于搞学生运动，只上一段时间课，不久便被退学了。我对别人打圆场说：“说我是中途退学有点学历诈骗的感觉，实际上我开始就退学了。”虽然没有在教室里学习，但是得到了在社会中学习的机会，广泛地结交了朋友。很早就和中国发生关系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距离成功的人生相当遥远，但是能有今天，也是

多亏了双亲和大哥。

我自己的每一步都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一丝遗憾。不过事实上我还是背离了双亲和兄妹们的期待。我甚至连表面上孝敬父母的事都没有做。父亲死后，孤身一人的母亲说：“你哪怕偶尔回来就不行？又不会遭什么报应。”可我却每天忙于工作，连这一点都没做到。

你也许觉得我的话有点离题，但我通过这些确认了所走过的道路和自己当前所从事的事业之间的关系，感到问心无愧。

我在招待所里一边喝酒一边和别人谈这些事的时候，上田信先生说：“这个事业是你的天职。”人家一说，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包括失败和错误在内，过去所做的事情以及众多老师和前辈的教诲，这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我今天的铺垫。

上田先生这么说，指的并不是一个被皮肤包裹着胴体的有形的我，而是指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关联、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由此发展了关系的我。想到这些，心里就觉得非常坦然、平静、踏实。

如果将幸福数值化

在绿化合作事业的初期阶段，浑源县林业局长温增玉带我坐着森林消防的红色吉普车到各村去考察。从那以后，我开始一个人去村里走访了。我们的植树点大多是位于山地和黄土丘陵的贫困村。

农家里没有茶。因为这里气候寒冷，常绿的茶树不能生长，但又不能奢侈花钱买茶叶。因为没有实物，好像连茶这个词也没有。一般是说“喝水”，拿出白开水招待客人。普通话是“喝水”，本地话是“哈水”，如果喝酒就是“哈酒”。到了县城虽然有茶，但还是说“哈水”。

如果表示特别欢迎的话，会在白开水里放糖。平常做菜时不放糖，糖一般存放在带锁的木箱里。他们把勺子给我，拿出糖口袋让我“多

放点儿”，围着的孩子们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咽吐沫声。接着又从木箱里拿出专为客人准备的带过滤嘴的香烟，也许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封了。

家里收拾得很整齐，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东西。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放在炕角，再盖上一个类似包袱皮的布，还有一张吃饭用的炕桌。没有炕桌的人家就直接把碗筷放到炕上。有刚才说到的木箱子的人家是条件好点的农户。灶堂间放有水缸和装调味料（酱油、醋）的坛子，同时还堆着装粮的麻袋。

火炕旁边有一个灶口，上面放着一口大锅。炒菜、蒸东西、烧开水都用一口锅。有电视的家庭多起来了，但接收信号不好，不一定都有影像。

农家院里、村里的道路上见不到垃圾，越穷的村子垃圾越少。最近才开始看到一些方便面的塑料袋。当他们把从城里运来的西瓜切给我们吃时，小鸡就会跑过来吃我们吐出的瓜子。扔掉瓜皮，小鸡就会群起把瓜皮发青的部分啄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纸一样薄的瓜皮。

厕所是一个2米见方、深1.5米的大坑，没有踏板。大便时背朝角落方向蹲下，屁股冲着坑。一想掉哪儿也不能掉进这里，就越觉得要被吸进去。我先在旁边练习，确认无误后才正式蹲上去。

人家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从没见过茅坑里有手纸，但又不能去现场窥测，所以至今是个谜。看到自己扔下去的白色手纸，“犯人”是谁自是一目了然，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曾经了解过他们一年中所做的农活。春节过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捡散落在道路上的家畜粪。其他季节也可以看到一大早就有人背筐去拾家畜粪。自家里的粪堆上如果来了别人家的小鸡，他们就会扔石头把它赶走。

环境的严峻、生活的贫困状况令我们难以想像。那么是不是当地人都堆缩着一声不吭，悲惨兮兮地生活着呢？事实上并非如此。



图：贫困村里的人笑脸朴实可爱，表情丰富。这个人比我的年龄还小。
(怀仁县，1993年10月)

与日本、特别是城市人相比，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非常亲密。有时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烦。我离开农村，或者说被农村抛弃来到城市再也不想回到农村，也是因为农村这种亲密的地缘血缘关系让我承受不起。可是在黄土高原这样的环境中，没有这种关系，人是无法生存的。

参加绿化团的年轻人曾经这样对我说：“贫困村里的人笑脸非常

可爱，表情丰富，有人情味。脸上深深的皱纹也觉得好看。如果到城里去做买卖，农村的朴实感就没了。大同和北京都很富裕，可是人们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亲切。一想到前面还有大阪等着你，真是不愿意回去。”有时我也这么想。

大学医院的护士中野纪子曾对我说：“为了参加绿化团，申请休长假费了好大劲儿，平常替同事们节假日值班攒假。看到农村人的笑容真是心情愉快，一年的精神疲劳都在这里恢复了。在这儿愉快地度过一周的我和一年到头儿在这儿生活的人，究竟谁更幸福呢？”

“你单身一人，干脆在这结婚算了。”我打趣道。当然，作为客人生活一个星期和终身在这里过日子完全是两码事。后来，她在日本结婚了。

说白了，现在人的幸福感可以数值化，分母是欲望，分子就是实现欲望。不管你的欲望能实现多少，只要是欲望膨胀，就难以逃脱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生活在日本的我们几乎被物质淹没，可是仍然会受到欲望的刺激。国民们不买东西，国家就以恢复经济为名，代替我们乱花钱。

反过来，从原理上讲可以有通过抑制分母获得幸福感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老庄思想也许就是这样。我对中国的气功感兴趣，其根本思想就是“恬淡虚无，无为自然”。也许所有的宗教都有共同之处。

我在学生时代一直有一种焦虑感，可能是因为从农村一下子来到东京不适应造成的。当时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持久。我感觉是日本一定是在哪个岔口选错了路，本来有一条重要的路径，但却被忽略走到错路上来。现在仍有这种感觉，但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

成绩驱动欲望

1999 年底，我们围绕着绿化问题在大同农村进行了民意测验。首先我起草了一份提问方案，然后和绿色地球网络的干事及大同事务所的人一起讨论敲定。事务所的人们对此事非常感兴趣，一共在 7 个县 21 个村进行了民意测验，比我原来期待的数量还多。

事务所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这还用说吗？光是提问的大项就有 26 个，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问得很深。发放测验表 950 份，回收 900 份，有效回答 884 份，成绩相当可观。

测验表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种树”。我们将所有村里的总计及与我们关系密切、具有典型特征的 5 个村子的回答作了统计，参见下表。

农民关于“为什么种树”的回答（%、可复选）

	整体	遇驾山	随土营	李二烟	吴城	上北泉
A 可以卖钱	30.8	23.3	19.6	0.0	71.4	80.0
B 自己用、吃	39.8	10.0	39.1	16.0	16.3	84.0
C 防风防沙、防止水土流失	74.6	56.7	54.3	88.0	42.9	72.0
D 美化改善环境	67.6	33.3	52.2	80.0	40.8	84.0
E 行德积善	25.1	6.7	23.9	0.0	6.1	62.0
F 没办法	2.0	0.0	0.0	2.0	2.0	0.0
G 其他	1.0	3.3	0.0	0.0	2.0	0.0

从数字上可以了解到该地区是如何重视绿化对防止水土流失、防风防沙的作用，也从中认识到这种思想正在渗透到农民中。

在另外一项提问中问到迄今为止参加植树的天数，回答 500 天以上的占全体人数 37.7%，100 天以上的占 66.0%。不仅在观念上，还在具体上参加了劳动。

关于“种树目的”的提问，A 和 B 是狭义上的切身利益，对于这

个问题的回答，不同村之间有很大差异。两项合计，上北泉村为 164%，李二烟村为 16%，其中对可以卖钱一项的回答为零。

但是对以改善环境为目的的 C 和 D 的提问，李二烟村的数字最高，为 168%。我们怎么看待这组数据呢？李二烟村的目的最纯，最好。几年前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北泉村和吴城村都种果树，此外还种了松树。上北泉村早在 15 年前就将陡坡窄地块改造成果树园，成为县里少有的富裕村。吴城村从 1995 年开始种杏树，1999 年开始收获，收入多的家庭可达 1 万元左右。

而李二烟村在大同市也是环境最差的一个贫困山村，人均年收入只有 100~200 元。我们从 1994 年到 1997 年在那里开展了合作，但是效果不好。

失败的原因不是农民的责任，而是县林业局的指导不力。比如说，按照当地的常识，种松树时应避开阳光照射的南坡，在背光的北坡栽种。可是在李二烟村，特意选择了阳坡整地种树。这样种下的树不可能成活，所以成活率只有 18%。

从这种意义上讲，狭义上的切身利益也不可忽视。不，应该说它很重要。从一开始就不期待有利益的项目似乎不能成功。

另外，我们对植树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做了提问。对“付出劳力或其他也没有回报”一项的选择回答参见下表。

关于“植树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回答 (%)

	整体	遇驾山	随土营	李二烟	吴城	上北泉
付出劳力或其他也没有回报	5.7	0.0	0.0	0.0	6.1	24.0

整体的数字只有 5.7%，不满意度不是很高。在 5 个村子中有 3 个村子数字为零。

但是在成果最明显的上北泉村，每 4 人中就有 1 人不满意。尽管是第一年但迎来了收获季节的吴城村也有一些人不满意。那么，我们又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呢？

如果没有欲望、希望，任何事情也做不好。如果得到了什么，欲望就会随之膨胀，也许人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此。何谓富裕？何谓人？很难说得清。

得与失

希望将来在国际合作部门工作的成田茂登子作为绿化合作团的一员访问大同是在 1996 年的时候。可能是过于兴奋，她在灵丘县扁桃体发了炎，发高烧。当地女医生昼夜看护，为她打点滴。一气打了近 20 支安瓿的点滴，真有点吓人，不过效果十分明显。翌日一早，高烧全退了。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宛如魔法的作用。

坐夜火车离开大同前，她边哭边谈了自己的感受。

“我本想为贫困地区的人做点什么，不仅没做成，反而添了麻烦。可是他们对我依然是那么热情。何谓富裕？何谓贫穷？我越想越明白了。”

在当地，自然灾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春天的风沙、晚霜、干旱；夏天的水灾、冰雹、虫害；秋天的早霜；冬天的冻害；再加上鼠害、兔害和一年到头刮不完的风，就像当地流传的说法“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除此之外，还有多发的地震。

尽管生活这样的环境下，农村人却很开朗。生长在日本青森县津轻的相马先生经常和我们一起在大同活动，他说：“我体验过战前日本东北的寒冷。真是悲惨极了。客观地讲，这儿比起日本东北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但却感觉不到悲惨。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解不开这个谜。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尺子去测量处于两个极端的富裕和贫穷。单方面援助贫困者的形式也难以维持下去。虽然也计划实施项目，但总是担心：这样做行吗？会不会带来副作用？会不会把当地的好东西给丧失掉。

所幸的是我们所开展的合作是绿化事业。绿化是个很不划算的项目，坏的结果立竿见影，好的结果却迟迟不出。但反过来看，效果虽然缓慢，但副作用少，在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思考。而且可以多次地反复。我们生活在物质极端丰富的日本，往往怀疑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已经失去了什么？得到的会不会就是失去的？想起来，也许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5年前中京大学的河宫信郎先生对我们说过的话至今记忆犹新。

构筑现代都市文明的大部分要素是生物介质。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均属此类。水泥原料的石灰岩是由生物的壳和骨架形成的。由于细菌的作用，铁由水溶性转变成了非溶性，因此才产生了铁矿石。否则，人类就会与铁无缘了。

形成都市的代表性物质，铁、水泥、化石燃料等是经过几亿年生物演变而成的。人类利用它不是生产，而是消费。经过上亿年时间才形成的物质在瞬间利用，理所当然效率很高，但是不久就会用完。核的利用从原理上讲是完全不同的技术，但是放射能无法做到完全隔离。换一个角度看，生产就是消费，得到的即失去的。

京都精华大学的槌田劭先生曾经讲过，就在不远的以前，小孩一发烧，父母就会抱着孩子用身体温暖，等待着靠小孩的自身抵抗力恢复健康。现在只要给吃抗生素和退烧药很快就解决问题了。可是从此以后，以前那种父子之间的亲情也就随之蜕化了。

在我早期的记忆里，有一次父亲抱着我跑了好几里路去看医生。所说的跑，是指父亲用自己的脚跑。那时候，我经常一发烧就痉挛。父亲像念咒语一样不断地对我说“阿邦，你要挺住啊”。比我早生一

年的二哥在出生后不久就死了，排行老三的我，受到了格外的照顾。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比较亲近也许和这种记忆有很大关系。写到这些，我不禁热泪盈眶。

得到什么，同时也会失去什么。人们往往能立刻感受得到时的舒适、方便，但不到彻底失去时却很难察觉。等到彻底失去时甚至会忘记它曾经存在过。

我觉得，人是很可悲的生物。正如在大同看到的那样，只要是挖井灌溉摆脱旱灾，确保粮食生产，大家自然就去挖井。可是一旦尝到了甜头，就再也没有办法后退了。谁也不会想到埋藏在看不见深处的地下水会枯竭。

所有的环境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得到的和失去的，如同硬币的两面同时并存，但是人们容易感受到得到的一面，却很难察觉到失去的东西。

过去我一直认为环境问题是产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产物，但是自从往返大同以后，想法发生了变化。大同曾是北魏时期的都城，早在5世纪时就已经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了。我现在认为，从诞生文明那一刻起，人类就已成为地球生态系统的癌细胞。

听我这么一说，立即遭到了大学同学的反对：“癌细胞也有生存的权利。”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

延续的生命

那是在绿化合作团乘车去农村时发生的事了。有个从车窗向外眺望的人喊了一声：“快看，这里在过节呢！”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以为是过节，因为那里又放烟花，又放鞭炮，还把拖拉机的拖车搭成舞台，有的人演戏，有的人戴着假面具，有的人拿着麦克风扯着嗓子唱歌。

可是，这是在举行葬礼！为把孩子拉扯大后过世的人举行葬礼好像过节举行庆贺活动似的。举行婚礼是红喜事，举行葬礼是白喜事。中国电影《老井》中有举行葬礼的场面，描写的是有人强迫卖艺的人唱艳情歌曲（故事背景也是山西省）。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各县的文艺工作队都是很健康的。

只要我们绿化合作团访问天镇县，他们就会为我们安排一个联欢晚会，县文工团的俊男靓女们为我们表演歌舞。我奇怪这么贫穷的地方怎么能够养活起专业舞蹈演员和歌手呢？当有一次我看到她们在拖拉机的拖车上演节目，就明白了。

人死了肯定会悲伤，特别是年轻人的葬礼。我不了解情况，有一次想拍照，结果遭到村里人的呵斥。

但是把孩子拉扯大后去世的人的葬礼，说成是白喜事，是一种文化。历史证明以这种形式接受人的死亡，是一种内涵深邃的文化。我想，日本在不久以前也是以同样的形式接受人的死亡的。我在农村长大，曾经以类似的形式送走过我的亲人。

但是，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这样了。不管是 80 岁还是 90 岁，死亡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如果是死在医院，不能从正门抬走，只能悄悄地从后门出去。

死在自己家里，也是一件麻烦事。听说曾经给过我很多关照、我一直敬重的一位人士在自己京都的家里去世后，被认为是不正常死亡，结果夫人被当作嫌疑人，还得接受警察盘问。

一旦死亡成为忌讳的对象，那么延长一天的生命也就有其意义，人们就会掩饰死亡。

我们常说“生命无可替代”。生命宝贵，不言而喻。在个体生命没有得到尊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强调生命宝贵是有其意义的。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生命果真无可替代吗？延续的生命，由儿子传给孙子的生命，在生命的衔接中得以延长的生命……我认为这些

才是真正的生命意义所在。这一切也是我从大同农村的“白喜事”中重新得到印证的。

2000年4月底，中宫寺住持日野西光尊师姑和药师寺副住持的夫人安田顺惠女士等访问了大同，参观了我们的几个项目。他们是我们这项活动一开始的会员，在最困难时期支持我们的最亲近的人。他们动员了国际女性协会奈良的5个俱乐部的成员，对我们的活动一直给予有力的支持。在阪神大地震时，我们还曾一起到处参加过救援活动。

我一激动，在车里用麦克风将上述内容讲了出来。在下车的时候，日野西光尊师姑低头双手合十对我说，“你讲得太好了”。顿时，我像被凝固了一样。惭愧！